

# 調查研究方法的侷限與貢獻： 回應《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-2005： 傳播與政治行為》

廖達琪

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

《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-2005：傳播與政治行為》，張茂桂、羅文輝、徐火炎主編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，2013年，408頁。

很榮幸受邀撰寫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」（以下簡稱「變遷調查」）所出系列三叢書的第四本專書「傳播與政治行為」之回應文章。因為本系列是針對「變遷調查」蒐集超過廿年(1985-2005)的資料進行整理及分析，所以本文的回應，會試著從「調查研究方法」本身的特質及限制說起，來審視「傳播與政治行為」這本專書的貢獻及面臨的問題，最後也提出一些愚見，期待未來研究者對「變遷調查」這項資料庫之建置及使用，有更豐富多元的想像，以收經驗知識綿延積累又突破創新之效果。

調查研究方法的崛起，大約是上世紀的中葉，在「行為主義」當道的思維下，社會科學各領域相當普遍的使用此方法蒐集資料。這一方法的好處是量大，在較精準的抽樣方法等配合下，可以得到有代表性的民意態度反應資料，也比較能檢證研究者依理論所提的假設；而這樣的理論假設，多少是回應「行為主義」研究典範所追求「律則性」(law-like)的理論特性。本文姑且先不在「研究典範」上再做討論辯難，僅就「律則性」理論追求這一前提所形成的現象，做一簡單探討。通常在這一前提下，資料蒐集及檢證，很大層面是在做既有知識

的認肯或填補，很難是知識的創新。如「傳播與政治行爲」這一書中較多觸及的是「政黨認同」（第5章「誰是泛藍、泛綠認同者」及第6章「民衆政治『兩極化』現象初探」），這一概念始於密西根學派的創造（1960，美國選民），後來泛溢到各民主國家，試圖成爲解釋投票行爲的「律則性」因素；台灣的選舉行爲研究也早已引入，但從概念到測量技術頗多修正，而相關研究議題則仍是圍繞這一概念，不是認肯「政黨認同」的重要，就是尋找非「政黨認同」的中間選民是誰（第5章），或是加添其他變數（如統獨及民族認同）來了解民衆政治立場的變化（第6章），也可以說，調查研究的題目多來自過往研究的理論框架，或業經實證認肯有效之問題，長期繼續追問下去，可以讓我們看到變遷，但較難從中提煉出新的理論。

調查研究方法的第二個較大限制其實是來自其優點；如前所述，有效或有理論意義的問題，在「調查研究」的特性下，可以週期性的持續問下去，所以「變遷調查」這一系列中的分析，可以做前後廿年的比較，這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，自有重要的貢獻及意義；但也因爲要以同樣的題目維持廿年以上（甚且五十、百年？）來探索社會變遷的趨勢並賦予意義，反而某種程度無法反映社會變遷下文詞、意理及概念的變化。比如第4章探討的台灣人認同問題（「狂飆的年代？一般民衆的認同趨勢，1992-2005」），引用的問卷題目爲「請問你（自認爲）是中國人、台灣人，還是兩者都是？」，這一典型測量認同題目，從1992年啓用到現在（2013），普遍爲調查界接受，好處如本書第4章之分析，我們可看到台灣的「認同」在此題目框架下的律動及消長，但也不禁令人質疑，1992年的「中國人」概念等同於現在嗎？這是要維持題目一致，以便長期追蹤的調查方法，無法解決的難題。

以上提出「調查研究方法」的兩大侷限——理論創新的相對保守及題型一致的相對僵化，並不表示「調查研究方法」就不可取，如前文已提及，它有缺點也是從它的優點中滋生的；如果沒有這一套方法，我們如何有系統、有根據的理解台灣的社會變遷？如「傳播與政治行爲」一書所展現，從1985到2005的廿年下來，在傳播方面，台

灣民衆改變了閱聽習慣，有線電視主導收視，蘋果日報衝擊媒介內涵（第1章）；而在政治動員上，今日電視遠比報紙有效（第2章）；但比較沒有改變的是民衆仍是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，對媒體的信任和受訪者的政黨支持相關（如泛綠選民較相信三立、民視或自由時報之報導，反之亦然）（第3章）。

再就政治態度及行爲方面而言，近廿年下來，台灣民衆的「台灣人認同」著實的成長了，「中國人認同」明確的萎縮（第4章），但如何賦予這個趨勢意義，以及如何從這趨勢醞釀理論或實踐方案，則是以目前的調查方法無法回答的。至於台灣政黨認同的變化方面，雖然表象上國民黨的認同下滑，但實質上分化爲新黨、親民黨，甚少轉爲屬性泛綠的民進黨及台聯（第5章），這基本上符合「政黨認同」理論的預期；且民衆雖有政黨認同的表象變化，但議題立場的極化傾向並不明顯或固定（第6章），這也可算是一個喜訊。而在「政治容忍」層面，台灣民衆整體的容忍度，廿年下來居然呈現的是下降趨勢，但似乎一些特殊的政治鬥爭情境，有牽動影響的效力；在經歷政黨輪替後（2000年），對特定且與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張之「容忍度」似較佳（第7章）。最後，在民間社團參與（第8章），及投票參與上（第9章），廿年下來，台灣民衆沒有更積極，反而仍制約在既定的社會系絡中。

總結，本書九章提供給我們台灣「傳播與政治行爲」變遷的圖象，或可簡單化約爲：媒體技術有變化，人性人情難轉化；政治政黨有競爭，國族認同受影響；社會系絡變化少，社團政參改進小。但了解這些「變」或「不變」的下一步爲何呢？以下提供一些淺見，就教於各方。

第一，調查資料庫的建置是有必要的，但很難是唯一的研究資料來源；學界提倡多重方法之運用已頗有時日，未來「變遷調查」資料庫的使用，最好能作爲研究問題的起始點，而不是目的地。比如台灣「國族認同」有變化，是目前資料庫之資料能支持，且學者已做了分析的現象；但這現象可啓發我們更多的問題意識，如理論一點的思考

或是：什麼力量真正主導「國族認同」變化？實務一點的關懷或是：這個變化可逆或不可逆？又如何善用主導力來強化我們希望發展的「認同」？而類似這樣問題的解答，都不是靠調查資料可解決的，但沒有這項資料為基礎，我們甚至無法提出相關的問題。再如，現有的發現顯示我們的社會系絡變化少，社團參與及活動並不比解嚴前更熱絡，這個現象意寓著什麼呢？有沒有城鄉的差距呢？如果我們看到政治上有南北差距，這樣的社會系絡與政治競爭的關聯為何等等。這些問題的回答，恐怕不能僅依賴一種調查方法及資料。

還有一例是：如果「政治容忍」提高是我們期待的社會發展方向，如何從現有發現中找出實踐推動的方案，也必須跨界深入的探討。

第二，針對調查問題為求延續比較，而與時空背景有所脫離的問題，比如前面提及「中國人」在廿年前與今日的意義可能並不同的情況，研究團隊或可發展「焦點座談」之機制，針對重要問題做質性的探討後，再形成新的題目。這一方面「台灣選舉與民主調查」(Taiwan Election and Democracy Survey, TEDS)研究團隊已有相當經驗，實可互相參酌；或彼此協商搭建合作平台，有些近似的題目，不須兩邊均做，以減少問卷題目數量，而能容納一些有意義的新題。

第三，資訊媒體技術一直在進步，民衆的使用習慣確實有改變，比如年輕世代對網路的高度依賴，而「變遷調查」是否亦能與時俱進，除了「面對面」訪談的週期性進行（其實越來越困難），是否亦能嘗試網路調查，一方面摸索新議題，補上一些即時資訊；另一方面，實驗新的資料蒐集方法，以補傳統調查之不足。

以上愚見，其實知道「說來容易，做來難」，但深刻感受到推動「變遷調查」前輩們披荆斬棘的辛勞，以及現在維持者夙夜匪懈的堅毅（請見本書「序言」及「附錄」），甚為期待未來研究者能善用此辛苦建置之資料庫資料，而繼續創造出生猛活潑的新知卓見，或提出來務實有用的解難方案，以不負衆多先賢的付出耕耘！而作為從政治學跨界而來的回應人，就難免有著光「說」不用「練」的輕鬆了！敬請讀者明察。